

有的部分，一方面心中還要自有盤算、設想，否則將來如何能像一個圖書館？因此，回憶起慰堂先生當年所花的心力，真是讓人覺得肅然起敬。對比現今的圖書館員，每每將圖書館經營得不理想歸咎於經費不足。當然，經費不足會使圖書館經營受影響，但其實任何一位當過主管的人都知道，天下從沒有經費寬裕得讓我們覺得滿意的時候，我們惟一的辦法，是學會將每一文錢都花在刀口上。把錢花對，發揮最好的效果，是管理上的最高境界。如果沒有學會花錢，再多的錢，也都會覺得不夠，也許現在社會富裕了，大家不覺得應該這麼認真，但當年的情況，是後人無法想像的。慰堂先生的這種創業精神至今仍然是值得景仰、學習的，特別是在圖書館未能讓社會大眾、政府官員充分瞭解的今日，我們更需要將經費運用得恰當，呈現最好的效果，才能促成圖書館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慰堂先生雖離我們而去，但是他老人家的精神，卻是我們永遠的表率 and 榜樣，他老人家對臺灣圖書館事業奠基的貢獻，更是我們永遠不該忘記的。要想作完整的記載相當困難，謹就個人感受最深的，舉幾例以茲紀念 先生百年誕辰。

（本文由本書編著者提供）

盧荷生（一九三一—二〇一一）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知名圖書館學專家、教育家。曾任職於中央圖書館擔任編輯、代理總務主任，後任教於北一女中、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慰堂先生與清史研究

陳捷先

我在臺灣住了五十年，在這半個世紀之中，有很多師長、前輩和好友是值得我感恩與懷念的，蔣慰堂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蔣先生是圖書館學界的名家，是傑出的行政官員，他的事功成就已經有不少人談到了，我現在只就他對近代臺灣清史研究方面所做的貢獻，寫出一些個人親身經歷的事實。

早在本世紀的五〇年代，臺灣仍被稱為「文化沙漠」，而中國大陸正在混亂之時，國際學術界對日本的清史研究給予很高的評價，尤其是美國治清史的前輩，如 John K. Fairbank、Mary Wright 等等，他們都認為東京與京都都是清史研究的兩大中心。無論是滿文老檔或是硃批諭旨，日本學者確已有了相當的水準與成績，出版了可觀的專書與論文，而當時的臺灣在這些領域中幾乎是一片空白，乏善可陳。事實上，臺灣的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以及各大圖書館多珍藏極豐富的清宮檔冊與善本圖書，只是當時學術環境剛剛恢復，經濟起步振興，做出的成績不多。不過，自民國五十四年故宮博物院遷址臺北之後，在慰堂先生的主持下，不但院務發展一日千里，使故宮博物院揚名國際；清史研究也藉由故宮博物院的多項努力，使臺灣在國際學術界的知名度大為提高，以下

三事，可以作為說明：

（一）公開清史文獻資料

我們中國學者比較保守，甚至還有以擁有珍貴書檔自重的，公開資料讓大家利用的觀念在以往不太普遍。慰堂先生則不隨流俗，別有主張，他認為院中既有幾百箱清宮舊檔以及數以千計的精醇圖書，這些從前外間不得共見的珍品，如不早日公開給大家參閱利用，實在是一種浪費，也是一種不進步的文獻管理辦法。他與院中高級主管昌彼得、吳哲夫諸先生商量之後，在清史有關的書檔方面，決定採取逐漸開放的政策，因而先有《故宮文獻》與《圖書季刊》等專刊的發行；年羹堯與袁世凱奏摺專輯的披露。既而出版了《舊滿州檔》，使滿族最古老的原始檔案公諸於世，讓大家更瞭解清朝入關前的國會秘史。最後在美國全國學術聯合會（ACLS）的鼓勵下，更大量印製宮中檔奏摺資料，包括雍正朝的硃批諭摺以及早期的滿文奏摺。另外，在故宮博物院中，又集合同仁的力量，將軍機處檔、宮中檔、國史館檔等有關資料，編目列卡，對外公開，以供各界參考，並任參閱者申請影印。這些珍貴的清史文件問世，無異是新開了當時臺灣清史研究資源的寶山，不僅給中外人士帶來極大便利，令大家可以在圖書館內，甚至個人家中閱覽相關資料，從事研究，寫作論文；同時也使國外學壇對封閉的臺灣學界改變了觀念，貼上了新的先進標籤。日本學者有人說慰堂先生的作風是「英明決斷」的，美國也有人稱蔣先生是「開明的前輩學人」，而更多受惠的則是臺灣本地治清史的，他們可以就地利用更多資料，從事多方面的研究。我個人認為，此後臺灣很多清史論著的出版，很多碩士、博士論文的完成，都或多或少得益於這批清宮的珍貴資料。

（二）贊助清史研究活動

慰堂先生對於臺灣地區的清史活動，就像他對圖書館界的活動一樣，總是不遺餘力、多方贊助。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言，在六、七〇年代間，當我先後籌開第三、四、五、六等屆「東亞阿爾泰學會」時，他都是極力支持的，不但出錢，而且出力，甚至提供故宮華麗的集會場所，使會議能順利而且有體面的召開。尤其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初的第一次「國際清史檔案研討會」，由於他的支援，得以在圓山大飯店舉行。當時出席會議的國外學者有六、七十人之多，分別來自美、英、法、德、日、韓、港、澳等十多個國家地區，在當日確是難得的盛會。故宮博物院為歡迎會議，特將院內珍藏的清史文獻瑰寶，精華盡出的做專題展出，以飽大家的眼福。蔣先生的這種慷慨行事，不但使會議在當時增添了不少光彩，在事後也有深遠影響，因為臺灣有豐富資料的美譽，也隨著外國學者的賦歸而傳布到海外了。蔣先生在博物院內也提倡一些與清史有關的活動，例如利用寒暑假，舉辦短期的文獻書畫等研習班，約請院內專家或是院外的學者，定期在博物院內講授清代圖書、文獻、書畫、器物等專題，對社會大眾傳播清代相關的專門知識，以誘發一般人對清代文史藝術的興趣，進而深入研究清代的學問。慰堂先生常對我們說，他對清代的研究不多，但他瞭解清史研究的園地是廣大肥沃的。他只願做平凡的小草，以自己的新綠來妝點清史這塊芳洲，希望有更多的人來此種花植樹。

(二) 推動清史合作計畫

慰堂先生執掌故宮博物院後，與國內外進行的合作計畫很多，與清史研究相關的計畫，就有兩項是值得一述：一是故宮博物院與臺灣大學歷史系合作創設藝術史研究所。儘管台大的藝術研究所現已有自立門戶，成為獨立單位了，但在創設之初，確是與故宮博物院有密切的關係，而且早期的研究生絕大多數都以清代各種藝術為研究主題。多年來這個研究所造就了不少專門人才，現在都已在國內外的學術研究機構中顯露角頭，甚至卓然成家了，慰堂先生的功勞實在不可抹滅。另一項重要的合作計畫是故宮博物院與國史館的纂修《清史稿校註》。大家都知道《清史稿》一書自民國十六年初稿寫成，次年匆促出版以後，一直被各方批評、檢舉與糾謬的文章很多，乃至於政府明令禁售。抗戰前後，政府與學術熱心人士雖想就其稿本「芟妄刪蕪，重泐信史」，但因戰亂等種種原因而未能如願。政府遷台以後，國防研究院曾在民國四十九年出版了《清史》八大冊，但內容多據《清史稿》，而且脫漏舛訛之處仍多，很難被公認為可信的正史。十九世紀六〇年代初期，中央民意代表多次提案敦請政府速修清史，行政院乃函請國史館辦理，但當時的國史館在台恢復不久，人財兩缺，重修定本清史，實非能力所及。直到民國六十七年初冬，慰堂先生在史學名家錢穆先生的鼓勵贊助以及院內同仁專家的支持下，乃與當時的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先生簽定《執行清史稿校注纂修計畫合約》。由於故宮博物院典藏原清史館部分檔案、書稿，院內又有大量清宮舊檔，因此校注的工作都由故宮博物院的專家昌彼得、索予明、劉家駒、莊吉發、馮明珠等幾位負責，採「不動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的辦法，參考清實錄、會典、東華錄、文獻通考、多種清代名人傳記、清國史館傳包、傳稿、歷朝國史稿以及原清史館存檔紀、志、表、傳等資料，逐條考訂，並註明出處，前後費時五載，共校注出歧誤紕謬等四萬多條。其後又由國史館同仁詳加校閱，添加新式標點，再經審查委員會最後核實，又增校注文兩萬多條，直到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全書校注工作才正式告竣，翌年由國史館刊行成書，分裝十五巨冊，都一千兩百萬餘言，為民國以來清史學之最大工程。《清史稿校註》的成書，不但使這部史稿成為可以信賴的參考史料，同時也為未來重修清史做出了極大的助益，鋪好了一條坦途。

以上是慰堂先生對清史研究方面所做貢獻中犖犖大者，也都是我個人親身經歷的事實。寫記下來，作為見證，也作為對慰堂先生一種尊敬的紀念，更希望這篇短文能對這位一生奉獻國家與學者的先賢，有發潛德幽光的作用。

（本文原載於《蔣復璁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

陳捷先，生於一九三二年，江蘇江都人，畢業於臺灣大學歷史系、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國際上著名的清史、檔案學家，精通滿文。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主任、歷史所所長。為韓國圓光大學名譽博士；臺灣大學、佛光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